

在交流互鉴中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柯文涛^{1,2}, 汪宜萍³

(1. 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 安徽省劳动教育研究中心; 3.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011)

[摘要] 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交流互鉴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路径。从文明交流互鉴来看, 教育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挖掘并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方位、多层次加强中国教育学和世界的广泛对话, 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认同度;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从学科交流互鉴来看, 教育学要始终坚守研究对象; 合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把学科交叉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创新增长点,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不断推进以中国教育学为核心的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从方法交流互鉴来看, 教育学要坚守教育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坚持教育学研究的问题导向, 重视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 迈向教育规范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深度融合、有机互构的范式新格局; 倡导教育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促进不同研究流派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关键词] 中国特色教育学; 教育学本土化;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G 4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5) 01-0042-10

2022年4月2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这不仅是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任务之后的又一重要任务, 而且也是对此前任务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这是因为: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知识化、体系化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基础、内核和凝练; 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构成了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具体外延, 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主体骨架。“三大体系”建设要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中心内容和关键目标,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内在支撑和理论基础。

一、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明确的基本问题

第一, 厘清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内涵。为了更好地厘清该概念, 我们首先需要与之相关的另一重要概念: 教育学知识体系加以界

定。从概念上讲, 教育学知识体系是指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教育学学科架构、教育学学术研究、教育学专业话语等多元形态为表现形式, 并且全面涵盖了教育领域里所有基础知识、概念、范畴、原理、理论、方法等内容的一个完整知识架构、知识系统。据此,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则是指, 在坚持时代导向、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前提下,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 扎根中国大地, 立足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实际, 合理借鉴其他学科或国外教育学的有益知识成果, 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专注于解决中国面临的教育问题和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教育问题, 进而独立发展和建立起来的并且具有主体性、本土性、原创性、体系性、开放性、科学性、稳定性等主要特征的知识系统。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意味着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体系的知识系统, 而且也表明它可以被分享的、源于中国且属于全人类的知识谱系。

第二, 明晰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和价值。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和价值在于: 其一, 它是回答我国和世界重大的教育

[收稿日期] 2024-09-22

[作者简介] 柯文涛(1995—), 男, 安徽池州人, 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教育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安徽省劳动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教育政策分析、劳动教育。

理论和教育实践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它是建构并繁荣中国特色教育学的重要基础;其三,它是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文化霸权的必然要求;其四,它是促成中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的必经之路;其五,它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支撑教育强国等系列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发展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之策。

第三,确立并坚持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原则。近些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多次讲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问题导向,凸显了问题导向的时代价值和深远意义。其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述,也蕴含了问题导向的方法论原则,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2]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在论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时也明确强调“坚持问题导向”^[3]。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曾提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4]而且,实现理论创新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要求。但要想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学者们只能从问题出发,即“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由此可见,问题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建构的生长点。因此,我国所要建构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该是一种问题导向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种能够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自主知识体系,能够为解答“四个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提供一种基于教育学视角和中国立场的正确答案。坚持问题导向,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

第四,明确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路径或道路。在我们看来,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急需走交流互鉴之路。这是因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是“闭门造车”,也不是凭借着研究者在书斋里苦思冥想就能实现的。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

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5]⁴⁶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交流互鉴的思想观点,同样适用于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因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本质上也是文明发展的一种实践样态,自然也应该遵循该本质要求。而且,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要保持自主性和中国性,也要注意开放性、包容性和继承性。我们正在主动探索和积极建构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是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形成的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的知识体系。不论是为了在包容开放中拓宽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视野,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中国教育学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以多元的方法构建各具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还是为了确保中国特色教育学始终葆有生命力、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其实都离不开交流互鉴。交流互鉴理应成为我们推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路径。

一方面,知识体系是文明的产物,文明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所以推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然要做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指出:“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2]鉴于教育学与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也要认真对待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以此做到学科之间、研究方法之间的交流互鉴。文明之间、学科之间和方法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三个相互交织的重要层面,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路径。

二、文明交流互鉴:在包容开放中拓宽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视野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其形成和发展与近代我国被迫打开国门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促进中国学术近代化先驱人物的严复,则“开启了全面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6]。随着严复译介的学术著作不断涌现,我国思想界逐渐了解到不同于国学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或学问。也正是在危机年代,因师范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7],作为舶来品的教育学也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被引进我国^[8],进而从最初的师范课程逐步演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问)。迄今为止,教育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已有百余年之久。而教育

学引进以来的百余年发展史,亦是教育学中国化的百余年进程。我国老一辈学者们提出的“教育学中国化”或者“教育学本土化”的命题,实则已经体现或彰显了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自主)意识^[9],但从表述上看,“该命题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因而无力承担起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使命与重任。本土建构是超越本土化之后,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一条可能路径。”^[10]即是说,本土化所化之事物,终究还是别国教育学的内容,而本土建构出来的教育学才能算中国的、自主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化阶段、关键阶段。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不均衡、全球学术关系的不平等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虽然我国教育学者在不断努力,但目前全球教育学的话语体系仍由西方教育强国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不少学者习惯于使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教育问题,甚至形成了教育学研究的“路径依赖”,言必称西方教育学者和教育学著作,似乎不在研究中使用一些西方的理论、概念或话语就显得不够“高深”,以及难以体现出高超的研究水平。

近些年来,我国教育学界愈发认识到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教育现象、分析中国教育问题时的牵强和无力,愈发体会到不能够简单地照搬照抄西方教育学,愈发体悟到西方理论的地方知识性与特殊性(非普适性)。此外,也必须承认的是,西方教育学除了具有特殊性、地域性等特征外,也还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正确性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西方教育学也还有很多值得中国教育学习借鉴的地方,但这种学习、借鉴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平等交流与包容互鉴。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存在,不应该对其做任何的价值性评判,非要评判出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我国一直以来倡导包容互鉴,并且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积极寻求平等交流与沟通合作,长期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5]468}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其实质是在坚持中国立场、扎根中国本土的前提下,不断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分享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成果与拓宽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视野,即从全球视野出发看待中国教育学和世界教育学的发展,研究借鉴,取长补短。为此,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看中国教育学自

主知识体系建构,我们应当做到: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在长期的学科建设中,我国也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这样一门重要的学科。客观来讲,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真理性、与时俱进等显著特征,它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为人们透视纷繁的教育现象、解释各类教育活动、解决各种教育问题、总结教育经验和教育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当前我们提及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乃是由中国教育学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方式方法建构的、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知识体系,而且这种知识体系不仅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知识体系,更是以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实践经验为根基的教育学知识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魂脉,而且也是在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突出中国性的内在要求。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我们难免会碰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处于指导地位,因而有助于我们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保持建构的主体性。一言以蔽之,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确实有用、确实能行。

第二,充分挖掘并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2]我们如今大力推进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不意味着要抛弃既有但尚不健全的教育学知识体系另起炉灶,也不意味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好的事物的抛弃,更不意味着对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割裂。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充分体现出继承性。在中国出现或发生的很多问

题,扎根于中国情境和中国土壤,并且与我们的历史传统、社会传统、文化风俗、思维方式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教育观念、教育行为的背后,还留有几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11],它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内在契合性,构成了中国特色教育学的文化根基。我国正处于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化阶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的理论滋养、思想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学者们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资源和思想源泉,而且也是我们与国外教育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资本。对此,教育学者应当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也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不忘本来,急需充分挖掘并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找寻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的各种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进而建立起自主自信的教育学,为全球教育学做出中国贡献,为人类教育事业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第三,全方位、多层次加强中国教育学和全球教育学的广泛对话交流,并在积极的国际对话交流中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认同度。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意味着中国教育学不能故步自封,而是需要主动地去拥抱世界,正视全球教育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历史机遇。对此,我们要统筹做好“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篇大文章,双向发力。就前者而言,我国教育学界要广泛邀请国外教育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到中国来访问、开设学术讲座与专题课程、参加学术会议,以及积极组织相关人员翻译国外最新的教育前沿成果。从后者来看,中国教育学者亟需走出国门,主动地与世界知名学者进行交流和沟通,并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强外文学术网站建设;注重国内外教育智库的交流对话;在国际知名的教育期刊上广泛地发表论文,以及通过出版外文版的学术著作等方式把中国的教育学成果推介至全球教育学圈,进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获得认可,让国际教育学界了解中

国教育学、了解中国教育学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中国教育学者要敢于站到全球教育学的“大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改变诸多外国教育学者对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刻板印象:“中国的教育很重要,但中国的教育研究重要吗”^[12],进而在世界教育学之林中确立起自己的一席之地。应然地看,中国教育学理应成为全球教育学圈的重要一员。实然地看,中国教育学也确实是在诸多的质疑声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教育学研究也取得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不少知名的世界高等院校和学科排名中,我国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教育学学科已然跻身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学科之列。两篇大文章的作用在于:前者可以让国际教育学者看到中国教育和中国教育学的快速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积累的丰富经验,后者可以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教育故事),加快建构国际传播的中国叙事体系。此外,在国际交流对话中,中国教育学者们还需要打破不同语言 and 不同文化之间的天然隔阂,集思广益,以一种全球教育学界听得懂、能理解、可接受的方式,打造一批又一批类似于“场域”“惯习”等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话语并传播出去,进而推动全球教育学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方面的变革,从而在全球教育学界逐步认可和接纳中国教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赢得学术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述的“学术话语权”之“权”,乃是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即“有理说得出”与“说了传得开”。学术话语权首先是一种“权利”,意味着中国教育学者可以在不受外界等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与研究分享,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其次是一种“权力”,意指学术主体之话语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具有的影响力、说服力和传播力。学术话语权之所以是二者的统一,是因为它们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学术话语权利的拥有和保障,可以不断地增强学术话语权力;学术话语权力的提升,又可以进一步强化学术话语权利。

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3]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继承性,决定了我们既要“不忘本来”,也要“吸收外来”,更要“面向未来”。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乃至整个

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而且它也必然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因而要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中汲取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诸多优秀、有影响力的成果,也构成了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它们可以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提供有益滋养。我们所提倡的“中国自主”与包容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的建构路径并不矛盾。目前,国际学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仍然占据比较大的优势,国外学界生产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此,中国教育学者要秉持兼容并蓄、虚心学习、海纳百川的品格,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洋为中用、融通中外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做到对外来成果的本土化、中国化。向国外学习,并不意味着中国教育学就会成为其他教育学的“跑马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带有批判性的意味,是基于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借鉴性学习,其本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三、学科互鉴与对话:在守正创新中提升中国教育学的时代回应能力

教育学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在百余年的学科发展中始终在回应和服务不同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学作为一门研究培养人的学问,其之所以存在、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一直回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等关乎时代脉搏的重大教育问题。中国教育学的这种内在属性早就镌刻在其引进之初,因为20世纪初作为师范课程的教育学被引进中国,原本就是为了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师范人才^[1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需要与之发展相适应和协调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因而也对教育学有了新的要求。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学也必须回应时代,必须在解决中国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其作为学科的合法席位^[15],进而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从学科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没有学科这个概念的,思想

家或学者也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才,但随着“系统化的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16],所以知识被人为地切分和分类,并“称一门知识为一学科”^[17]。随着很多问题愈来愈复杂,仅凭某一学科的知识体系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国内外学界又开始倡导跨学科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教育学为例,其并不是孤立的学科,而是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有着密切关联和研究交叉的一种复杂性存在。

很多出现在教育领域里的问题,实则是复杂的、交织了多种因素的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和呈现,因而不单纯是教育问题。要想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智慧。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化是当前学科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教育学和其他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和独特优势,它们能为中国特色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滋养,所以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互鉴。但无论如何,中国教育学在注重开放性的同时,也需要保持自主性,维持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学科特色,坚守研究论域,不断提升回应时代、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此,我们应当做到:

第一,始终坚守教育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在一般的认知和理解中,教育学者们通常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叶澜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教育学作为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总称,它具有事理研究的特殊性。”^[18]此界定进一步扩大和丰富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即是说,教育学是专门研究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的学问和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实际有着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也是充分体现了教育学之所以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横向来看,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均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来自不同学科的科研工作者对这些独特的研究对象的充分研究也构成了不同学科的特色。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对判定一门学科是否成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说当前正处于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深化阶段,急需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互鉴,但不管怎样,我们仍

然需要坚守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这是保持教育学学科独立性、彰显学科特色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淡化了或模糊化了研究对象,那么就会本末倒置,背离了甚至阻碍了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第二,合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教育学是一门“人学”,它以人类的教育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然而,人类的社会活动却是丰富多样的,除了我们所说的教育活动外,人类还存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等其他方面的诸多活动。这些活动本身统一于人这个主体,但不同学科基于独特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构筑起来的研究边界,使得学者变得专业化,生产出来的知识或得出的研究观点和结论往往只是局限于人类的某一活动方面,甚至是某一活动的某一个方面。这使得许多专业化的研究者们对不少重大问题的解释是片面的,甚至是矛盾的、相反的。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研究者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必然要超出其曾经接受过的单一学科规范范畴。事实上,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占据较大优势的西方,也在不断地推动学科之间的交流互鉴,如借鉴社会学理论的经济学研究、借鉴人类学理论的社会学研究,等等。哲学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门系统学问。人们在教育、经济等不同领域做出的不同行为,存在关联性,因而需要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这些行为,才能真正理解鲜活的人本身。如上文所说,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然要回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能否做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取决我们有没有合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而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给出更为综合、系统、全面和科学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是必要的。丰富的教育学术实践活动也为我们表明,此举是可行的。此外,还应指出的是,所谓“合理”,即是说我们要处理好吸收和借鉴过程中要重“神”轻“形”。质言之,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其根本在于掌握其他学科秉持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而不局限于其他学科的分析框架、概念等“形”方面的内容。归根结底,此举最终还是为了反哺教育学、提升教育学的理论品质。

第三,把学科交叉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创新增长点(学术增长点),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

需求不断推进以中国教育学为核心的交叉学科体系建设。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没有创新,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则难以为继。随着我国科研工作者队伍日趋庞大,在教育学的传统论域中很多研究议题都已经被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研究过,研究队伍中的后来者要想对既有研究“接着讲”以及讲出新意的难度很大。此种情况下,带有学科交叉性质的研究领域则成为了学者们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因为新议题、新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度更高,研究者得出创新性的结论更容易一些。比如,随着我国人口规模的不断变化,我国亟需构建起基于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但要想解决这一急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则需要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共同攻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交叉必然会推动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必然会促进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2020年,《新文科建设宣言》正式发布。作为“四新”之一的新文科建设,其“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19]。新文科建设积极倡导学科之间(特别是文理科)的交叉融合。作为新文科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教育学,其实也一直在尝试和探索如何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即教育学交叉学科。事实上,中国教育学交叉学科是在引进初创的基础上才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发展的,并在自主建设、学科群的形成与规模化、话语权和影响力得以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教育学实际上又形成并出现了很多新的二级子学科或新兴的交叉学科,如教育神经学、教育政策学、教师教育学、研究生教育学、海洋教育学、(少数)民族教育学等,以及运用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其他学科问题的体育教育学、音乐教育学、数学教育学、语文教育学等。教育学是这些新兴交叉学科的内核,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回应其他学科、其他领域里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教育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除此之外,在一些新兴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我们也能够看到教育学的身影,这不仅凸显了教育学的时代价值和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不可或缺性,而且对教育学人积极参与到中国特色教育学建设、推动教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自信与鼓励。客观来说,教育学学科交叉并非随意的行为,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关系人类美好教育生活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根据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来判断是否需要教育学方面的知识,进而寻觅交叉的可能性及其可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交叉学科建设非常重要,面向未来和世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以中国教育学为核心的(教育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提升教育学回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能力。

四、方法交流互鉴:以多元的方法建构各具特色的教育学知识体系

从研究方法本身来看,它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共通性或通用性的特征。目力所及,几乎不存在为哪一门学科所独有的、专门的、定制化的研究方法。以访谈法为例,包括教育学在内的诸多需要“与人打交道”的社会科学,都在频繁地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也未曾听过学界争论该方法是属于社会学的,属于人类学的,抑或者属于其他学科。这是从方法的使用或者应用的角度来讲的。更进一步讲,即从方法的“源头”来看,很多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创造出了不少富有成效的、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源于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促进教育学研究、推动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育学对诸多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的解释力。正处于深化阶段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这是重要的抓手。因为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教育学运用研究方法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教育现象和解决教育问题,而这种学术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在促进和推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此,从方法交流互鉴的角度看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我们应当做到:

第一,坚守教育理论研究在整个教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从教育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教育学研究主要分成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三种类型。三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学研究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三者之中的教育理论研究是最为重要的研究类型,而且处于基础性的地位。这是因为:1. 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即是说,教育理论研究具有实践问题取向和政策取向^[21],可以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依据,有助于指导教育实践、改善教育实践。2. 教育理论研究实则承担着建构教育学知识体系

和教育学理论框架的重要任务,可以为教育实践和教育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概念基础。3. 教育理论研究也是推动教育创新和教育变革的动力源泉。当前社会各界出现的一些声音,如教育理论落后于教育实践、教育理论无法指导教育实践、晦涩难懂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无法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等,揭示了当前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不尽如人意,即人们理想中的教育理论研究应该发挥的功能与其实际所起到的作用之间还存在鸿沟。然而,这种对实然的教育理论研究的批评背后,实则也反映和呈现出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教育理论研究应然价值的充分肯定。否则,也就不会有这些批评的声音。

第二,坚持教育学研究的问题导向,重视新技术、新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已然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学术界已经在倡导,我们要从学科性学术走向问题性学术。教育学研究也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教育学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事实上,早在 2019 年,教育部就曾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明确强调教育科研工作者应当“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22]。这也是党和国家对问题导向的教育科学研究的大力提倡和倡导的一种具体体现。教育学研究应当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紧扣时代旋律,把准并认真研究解决教育学领域里的重大问题、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将问题导向贯穿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全过程,推动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创新。此外,从技术层面来看,我们身处一个智能化的科技时代,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而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衍生出新形态的生产力,其中也不乏可以为教育学研究所用的技术、方法和工具。就创新与知识生产而言,研究者使用了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出新的研究结论或观点,开创学术研究的新范式、新格局、新生态,这就意味着学术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构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重视对新技术、新方法、新工具的使用。

第三,跳脱教育规范研究(思辨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迈向教育规范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深度融合、有机互构的范式新格

局。既有学术实践活动表明,教育学研究中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范式之争一直存在。一方面,从事教育规范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对很多教育实证研究成果(尤其是定量研究)的批评点在于:此类研究虽然运用了一系列复杂的公式、模型等研究方法,但往往得出了一个人们已经熟知的结论,看似新颖,实则没有完成知识创新。而且,教育实证研究过分追求科学化,对数据、量化工具、新兴技术过分崇拜,进而忽视了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从事教育实证研究的学者们往往秉持着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主张教育科学研究要想做到“科学”必须要基于证据,依靠证据得出研究结论,而不应该成为没有证据支撑的书斋式研究,也不能够在研究中掺杂过多的人的情感和意志。时至今日,这场论争仍在继续。从本质上讲,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分歧与论争,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自身利益的考量,而不是来自研究范式本身”^[23],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种研究范式有着不同的学术追求,前者旨在“求善”、讲究“应然”,后者致力“求真”、关注“实然”^[24]。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当前我国教育学界大力提倡实证研究,此举在于“纠偏”,同时也说明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学者们并未重视实证研究,而是将精力主要放在了规范研究上。抬高或贬低其中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是不合适的。教育思辨研究可以生产出新的知识和观点,教育实证研究也能帮助人们确证假设的真伪。两种研究范式都是教育学研究的重要范式,不存在孰高孰低,它们也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质言之,教育规范研究和教育实证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而且,研究范式的使用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本身。更确切地讲,好的教育实证研究往往离不开教育规范研究,甚至以其为研究前提;教育规范研究也能从教育实证研究中汲取智慧,促进知识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教育学研究在范式上有所变革和调整,急需研究者摒弃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和功利思维(谋生思维),从而迈向两种范式深入融合、有机互构的范式新格局,共同为教育学的繁荣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第四,倡导教育学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不同研究流派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绘制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多样化、多元化图景。周洪宇教授指出,“学术研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最忌‘统一思想,统一认识’。”^[25]历史地看,毛泽东早就提倡学术研究的“双百”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2]教育学研究亦是如此。不同教育科研机构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展现出各自的特色,打造独一无二的学术名片。客观来说,教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当我们提及中国的教师教育研究、教育现象学研究、教育哲学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教育政策研究、道德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及教育学史研究、教育社会学研究、农村教育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研究等不同的研究领域时,总能想起国内代表性的研究流派。而且,每个研究流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全国知名学者。虽然从不同高校学科建设和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学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因为他们都需要为各自所属的科研机构做贡献;但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些来自不同研究流派的学者们,均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骨干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应该是合作伙伴,是同行者,而不是竞争者。为此,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这个更为重要的任务来讲,来自不同研究流派的学者们需要更为广泛和密切地交流与合作。这不仅是促进教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也是取长补短,提升自身学术水平、拓宽学术视野的重要路径。唯有如此,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才能达成学术共识,夯实基础,多样化、多元化图景才能得以实现。

五、在本土诉求和全球视野中实现教育学的共同繁荣

在老一辈教育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教育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现了长足的发展,跃升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时代的不断发展,对中国教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得中国教育学正处于一个应有所为、可有所为、能有所为的重要阶段。一方面,中国教育学之“中国”,意味着此种教育学乃是中国的教育学,即强调它要能真正地解释中国的教育现象、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教育问题。这表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面向本土、关注本土,要立足本土诉求。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学之“教育学”,意味着它是全球教育学之林中的重要

一员,因而要为解决世界上普遍性的教育问题作出贡献,提出方案,特别是要能够在理论和概念方面实现有效供给,能够解决教育的别国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因而要面向世界、关注世界。而且,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也是在坚守自主性的基础上倡导开放性、包容性和继承性,要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为中国教育学的繁荣发展所用。这也表明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有全球视野,并且要立足于此视野看中国教育学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教育学是一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要学问。

迄今为止,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尚未完成,仍任重道远。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状况来看,教育学人们不负时代使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例如,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健全,教育科研工作者积极回应教育领域里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形成了“立德树人”“时代新人”“教育家精神”等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学概念,提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等一批新的教育学命题,涌现出以叶澜教授为核心和代表的“生命·实践”教育流派、以裴娣娜教授为核心和代表的主体教育流派、以李吉林为核心和代表的情境教育流派、以朱小蔓教授为代表的情感教育流派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本土教育流派,等等。可以说,一批又一批教育学人对中国教育学的百年书写,强有力地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建成具有了现实可能性。

但也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如作为建构重要基础的教育学研究重“价值论证”轻“知识论证”、教育学话语体系尚未系统形成、教育学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这些都是在今后进一步深化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要予以解决的问题。今后,不论遭遇何种情况和情境,中国教育学始终需要坚持学科的独立性,确保学科的独立地位,即便是在教育学交叉学科体系建构过程中也要保证以教育学为核心。此外,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既不能让国外教育学研究主导中国教育学研究,也不能过分强调和宣扬中国教育学的理论和话语的全球普适性。中国

教育学的发展远景是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以期实现共同繁荣,共同为人类教育事业、为人类美好教育生活做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2]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9 (2).
- [3]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2 (24): 4-22.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6] 纪宗安, 刘永连. 丝绸之路与中外文明交往 [M]. 广州: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22: 206.
- [7] 侯怀银. 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 [J]. 教育研究, 2001 (12): 64-69.
- [8] 靳希斌, 王炳明. 我国教师教育模式变迁探析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8 (4): 3-7.
- [9] 郭志辉. 论全球化时代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问题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5 (1): 15-23.
- [10] 柯文涛. 从本土化走向本土建构: 中国教育学科建设的可能路径 [J]. 当代教育科学, 2020 (12): 3-10.
- [11] 张坤, 陈卓. 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 (4): 1-4.
- [12] 丁钢.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第2辑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1.
- [13]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4-11.
- [14] 陈雅珍.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危机略论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5 (2): 78-81.
- [15] 颜雪梅. 教育学学科境遇的商榷——从孔德的知识等级论谈起 [J]. 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8 (2): 21-24.
- [16] 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 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M]. 刘锋,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9.

- [17] 华勒斯坦. 学科·知识·权力 [M]. 刘健芝,等,编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9.
- [18] 教育发展研究记者. 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叶澜教授访谈录 [J]. 教育研究, 2004 (2): 33-37.
- [19] 樊丽明. “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 (5): 4-8.
- [20] 侯怀银,原左晔. 教育学交叉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 (5): 4-13.
- [21] 教育发展研究评论员. 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问题与政策取向 [J]. 教育发展研究, 2008 (1): 95-110.
-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19 (10): 17-22.
- [23] 王卫华. 教育思辨研究与教育实证研究:从分野到共生 [J]. 教育研究, 2019, 40 (9): 139-148.
- [24] 李琳璐. 教育研究范式的祛魅:思辨与实证的融合共生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1 (3): 31-38.
- [25] 周洪宇. 对教育史学若干基本问题的看法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9, 11 (1): 5-16.
- (责任编辑:上官林武)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education Pedagogy During communic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KE Wen - tao^{1,2}; WANG Yi - ping³

(1.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2. Anhui Labor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Anqing, 264133, China;

3.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for Chinese education pedagogy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oblem - oriented methodology.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re the core key pa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education pedagogy must adhere to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 explore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innovative ways; , strengthen the extensiv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education pedagogy and the world in an all - round and multi - level manner, to enhance the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pedagogy; , and absorb all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an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ary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education must always stick to be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object; , reasonably absorb and learn from the theories of other disciplines; , tak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s an innovative growth poin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pedagogy,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 with Chinese education pedagogy as the core given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on methods, education pedagogy must adhere to the basic position of educational theory research; , adhere to adopt the problem - oriented approach of education research pedagog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thods in education research pedagogy; , move 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deep integration and organic mutual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al normative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 advocate the blooming of a hundred flowers and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in education research pedagogy, and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search schools.

Key words: Education pedag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ocalization of Education pedagogy;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Education pedagogy